

红色故事

1934年,红六军团进凤冈

■ 周君

1934年10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行至石阡甘溪时,突遭湘、桂、黔联军约24个团伏击,红六军团前卫部队与敌激战了近10个小时后,突围冲出甘溪。一部组成先遣队,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的带领下直奔黔东,寻找贺龙、夏曦和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另一部则在红五十一团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的带领下也随先遣队向黔东一路而去;还有一些突围时被打散的红军,则在甘溪附近与任弼时、萧克、王震带领的红六军团主力会合。由于在甘溪未能击败敌军,军团主力陷入了湘、桂、黔联军的包围之中。在随后近半个月的时间里,红六军团为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战斗,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和消耗。战士们往往是饿着肚子不分昼夜地在北至石阡本庄、龙塘和凤冈天桥,王寨以及思南板桥,南到施秉马溪、紫荆关和镇远路腊、大地方这一崎岖峡谷中辗转鏖战。战斗、饥饿、伤残、疾病使得部分战士掉队,散落在这一带的莽莽大山之中。一直负责前卫开路和后卫断后掩护军团主力南撤转移的红十八师及五十二团的部分指战员180余人分三路于10月16日至18日进入凤冈境内。

1934年10月17日上午,40余名红军顺着本庄至凤冈的山路,走到乌江边大碛洞附近的河内渡,突遇本庄区长吴登仁派守在渡口处的小股驻军和民团袭击。尽管当时大战后疲惫的红军指战员凭着勇气和智慧,将渡口守敌击溃逃离,并留住了负责摆渡的船工郑顺和,但也因此伤亡了12人。一直听信反动宣传、害怕红军的郑顺和在红军的说服教育下,用小木船将30多名幸存的红军送过河内渡,然后又领着他们经麻湾、瓮腰溪、凉风坳,于当天下午抵达天生桥(今凤冈县天桥镇所在地)街头观音洞里的庙子里。那天正值天生桥赶场,郑顺和

将红军带到街头观音洞庙里住下后,便借故离开,并在街上将红军来天生桥的消息传了出去。一时间天生桥街上“不得了啦,‘共匪’来啦,快点跑呀!”的叫喊声此起彼伏,那些正在街上赶场的人们也很快就走了。红军到达天生桥后分成两路,一部分住在街头观音洞庙里,另一部分则借住在团山堡一户人家的老房子里,并派出一小队红军到街后的关马洞驻扎警戒。红军住下后,通过和当地百姓接触,了解到当地一个乡长陈海阳思想开明、善交朋友、喜做好事,便立即派人找老乡带路去漆树坪乡找陈海阳商议在此借路借住的事宜。陈海阳见前来找他的红军战士说话和气,便对红军产生了好感。他借故出门,询问了带红军来乡里的老乡,当他了解到红军到天生桥后纪律严明、无骚扰冒犯街上住户的行为后,想到刚才红军已经主动向他表示是借道临时住几天就要走,便进屋答应了红军的请求。

二

据游朝佑老人(当年是乡里的乡丁)生前回忆:“红军应该是在1934年10月18日的那天晚上到旧寨的,记得那天傍晚我正在漆树坪乡乡长陈海阳的老家旧寨庙湾的屋里,听陈海阳与家人摆谈红军昨天到天生桥后找人与他联系借路借住的事,突然漆树坪乡乡丁队长丁刚(余庆关兴人)跑进屋来将头附在陈海阳的耳旁细声嘀咕了几句,坐着的陈海阳边听边不住地点头。丁刚说完后,转身便出去了,不一会儿,他领着几个穿灰色军服的人走进屋来。陈海阳站起身来,与进屋来的人站着摆谈了一小会儿后,便转身安排我和正在屋里的吕瑞清、赵明亮、王树清去打他家右边约200米处的庙湾庙子,说是给过江来的红军居住。我们立即拿着扫帚,打着火把去庙里,刚把庙子里的卫生打扫完,30多名杆棍绑带、互相搀扶的红军,便顺着江边的

大路上来住进庙里。陈海阳也带着丁刚从家里过来看了看住下的红军后,便马上吩咐佣人回去背两背背粮食过来送给庙里的红军,然后他便带着我们上漆树坪去了。”

游朝佑还回忆说他一共给那批红军带了两次路。“第一次是1934年10月19日中午,陈海阳乡长安排我带那批红军去余庆关兴的腊水桥,我将他们带到后便回老家高家岩口了。第二次是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正在高家岩口挖土,突然见一群穿灰色军服背枪的人,从关兴的腊水桥方向朝这边走来。我丢下手中的锄头,紧张害怕得转身要跑,那些人边朝这边走边操着外地口音大声朝我喊道,‘喂,老乡你不用怕,别跑,我们是穷人的队伍,自己人,能给我们带路去天生桥吗?我们给你钱。’待他们走近,我一看就是那天陈海阳安排我带去腊水桥的那些人,于是心里便不怎么紧张害怕了,就答应给他们带路。当我带着他们走到漆湾子时,从对面山坡上也走下来一大拨穿灰色军服的人。双方看见后,都立即停了下来,然后互相大声吆喝了几句我听不懂的外地话,坡上的那些人便快步走下坡来,两拨人合在一起。那位叫我带路的人这时也走过来对我说,‘老乡,我们要找的人找到啦,谢谢你啦!’他边说边从身上掏出一块银元递给我,我见才给他们带那么远的路,又想到乡长陈海阳对他们都那么好,便说‘我没给你们带多远,算啦,就别拿带路钱了。’那人却执意要给我,我推说一会儿后,他见我执意不收,便将手中的银元收好,又从身上掏出一个粑粑递给我吃,当时我也确实有些饿了,接过粑粑就开始吃,吃完后我对他们说翻过前面熬溪水山坳,顺着大路直走不远便到天生桥,说完我也转身往回走了。那两拨合在一起的红军也往天生桥方向去了。”

三

1934年10月16日,约40余名被丁

田井明老人生前回忆:“那段时间我们经常牵牛去四顶山大庙附近放,常看见坡下的医生陈海大爷爷带着他儿子陈永林上山来给庙里养伤的红军包伤换药。在庙里养伤的红军对我们几个小放牛娃也很热情,教我们唱歌、做木头红缨枪,给我们讲故事。那几个伤员在大庙里休养了一个多星期后,陈海大爷爷就到小河街上买了4捆灯草,让那4位红军伤员背着灯草,装扮成当地卖灯草的百姓,由他亲自送下四顶山,进梓柏沟往天生桥方向,经茨菇田下河内渡过乌江去寻找他们的部队去了。”

四

几天后,红六军团主力已东去江口、印江一线,湘、桂、黔联军主力也尾追而去,石阡境内敌人防范相对空虚。在乌江北岸凤冈天生桥一带休整的红五十二团部分红军便离开天生桥,过江去石阡东寻找他们的主力部队。

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部分散失红军过乌江进入凤冈境内后,由于执行严格的革命纪律,让国民党反动派多年来在这一带群众中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丑化宣传不攻自破,仅几天时间,当地群众就发生了由当初的惧怕红军到认识红军、同情红军,最后到帮助红军的巨大转变。尽管红军在凤冈居住的时间短暂,但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为凤冈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据《贵州政协报》)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乌江河内渡渡口遗址。

贵州人与《四川盐法志》

■ 张文建



丁宝桢塑像。作者供图

提起《四川盐法志》,许多人知之甚少,但提起丁宝桢,想必就家喻户晓了。的确,《四川盐法志》正是丁宝桢修的志书。要说《四川盐法志》,得从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推行盐务改革说起。

丁宝桢(1820—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毕节市织金县)人,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任四川总督。一到四川就任,丁宝桢就“旁咨博询”“沿途悉心体察”,了解四川情形。此时的四川还不是为人所称道的“富饶之区”,而是财政入不敷出,官员竟尚奢靡、盗匪横行,百姓苦不堪言。此外,历史上,四川是盐务大省,川盐是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省食盐的重要来源,盐税占据四川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然而,现实却是川盐入滇、入黔中断,百姓食盐困难、政府收支难维。

于是,丁宝桢从“川省第一大政”——盐务着手整顿。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丁宝桢上书朝廷,提出对川省盐务进行改革——推行黔边盐务官运商销。

所谓官运商销,又称局运商销,即由官府直接经营食盐的采购、转运,仅在销售领域委之商贩。其具体举措是:在四川泸州设立办理黔边盐务总局,在产盐的富顺、犍为、射洪三厂分别设立购盐分局,在綦江、涪州、合江、永宁四岸及近边之各厅州县分别设立售盐分局,厂局负责买盐运给岸局,岸局接收之后卖给商人,最后由商人卖给各地的百姓。至于官运商销的具体事务,则由黔边盐务总局全权负责。

在实行官运商销的过程中,丁宝桢还通过制定裁减浮费、清厘积引、兼办计岸、引归局配、实给船价、酌给奖叙等举措,以保证改革措施的顺利施行。在《筹办黔边盐务官运商销折》中,丁宝桢提出,若实行官运官销,则“费用过巨,

稽查难周”;实行官商并运,则“在途则多夹带影射,在岸则虞垄断把持”,唯有官运商销,才能“以简御繁,诸弊可期断绝。”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总办黔边盐务局、候补道唐炯等人的大力协助之下,丁宝桢实行的官运商销短期内就取得成效。据《丁文诚公奏稿》中的《黔边盐务情形片》,从光绪三年(1877年)十二月到次年四月底,短短5个月,黔边已销售本年额引四分之三,收各项盐税超过38万两,相比往年“销引已属加倍”“收厘亦已增多”,到年底“必可带销积引一万余张”。此外,各大小商灶“踊跃趋公”、井河及沿江船户“添造船只”承担官运、各岸商人“争售官盐”,川黔各岸已有“食贱之喜”,黔边盐务官运商销“似已大

臻成效”。

在此背景下,丁宝桢实行的盐务官运商销范围也逐渐扩大,先由黔边推广至滇岸,再由黔、滇两岸推广至湖北例食川盐的8个州县,累计在4省40多个厅州县推行。据《官运盐务督本还清余款分别存留备拨折》,到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其实施的川省盐务官运商销累计为清政府创收300多万两白银。

在四川盐务改革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光绪七年(1881年)十二月,丁宝桢上奏提出编纂《四川盐法志》。在《拟纂(四川盐法志)片》中,丁宝桢首先指出,各盐务省份均颇有《盐法志》,因此当地“官商灶户,无不奉行维谨,罔敢逾越”。四川省盐务混乱,“骇人听闻”的原因固然是“官、商之敢于贪污”,更重要的则是“虽

有成法可循,究未定定为志乘颁发通行以资准则”。因此,在当今官运商销“纲纪秩然,百弊略净”情况下,“拟为久远遵守之计”,与盐茶道松蕃、建昌道唐炯等编纂《四川盐法志》,“期为四川省日后不易之定则”。

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在松蕃、唐炯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四川盐法志》编纂成书。于是,丁宝桢上《(四川盐法志)成书恭呈御览折》,“缮具黄册”“恭呈御览”。同年,丁宝桢总纂的《四川盐法志》正式刊刻。

关于这部志书的目录编次及缘由,《四川盐法志》收录的一份丁宝桢的奏表有详细说明:“若夫宪典悉遵,圣训黜恤,渥被皇仁;敕书则巽命重申,圣制则天章首焕,特先恭纪用弁于端。泉脉伏地,宜附丽于方州;民食为天,等艰难于稼穡,则以《井厂》次之,而各图说系焉。计边分岸,比飞乌挽粟之劳;水陆交驰,见雷駉云舳之利,再次以《转运》,而疆域运道各图表系焉。盐人楮书,遂沿流为交子;水衡主利,用分佐夫度支,又次以《引票》《征榷》,而《配引》《榷额》二表系焉。然而官司主计,治法必有治人,蠹蠹多私,兴利必先剔弊,则《职官》次之,《缉私》又次之。至若人境问禁,那有常刑,则《禁令》尤宜共守。援古证今,义资考镜,故《纪遗》用以终编。”

翻开天津图书馆藏光绪八年(1882年)四十卷刻本《四川盐法志》,在“纂辑职名”下,有两位熟悉的贵州人,一位是担任“提调”(负责志书编纂调度督促)的四川分巡建昌兵备道、办理滇黔边计盐务、今授云南布政使唐炯,还有一位是担任“采访”(负责采集寻访资料)的四川特用知府华联辉。

唐炯(1829—1909年),贵州遵义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举人,在丁宝桢推行的官运商销盐务改革中担任黔边盐

务总局总办,在盐务改革中起到中坚作用。对此,丁宝桢对这位贵州老乡也是高度肯定、夸赞有加,多次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举荐,如“于川黔两省边陲民情洞澈无遗,而才气亦足以济事”,“忠正强毅、清操绝人,其公尔忘私”,“心精力果、守洁才明、矢志公忠”。光绪六年(1880年)二月十九日,丁宝桢在盐务官运商销大有成效下,向朝廷上《保举人才堪备任使折》,特意举荐唐炯,说他“秉性刚毅、操守谨严、识见宏远、才气深厚”,实在是“文武兼资、缓急足恃,堪当大任之才。”也是在丁宝桢的大力举荐之下,唐炯从最初的候补道员实任四川建昌兵备道(正四品),再到后来升任云南布政使(从二品),成为一省封疆大吏。

华联辉(1833—1885年)也是贵州遵义人。他既是茅台酒的创始人,也是丁宝桢盐务改革中的关键人物。在参加盐务改革以前,华联辉是贵州有名的盐商,深谙盐务和经商之道。当唐炯向丁宝桢推荐华联辉负责盐务官运商销的具体事宜时,丁宝桢“即函致来蜀,与之咨商一切”。在交谈过程中,丁宝桢对华联辉提出的“非专意于恤商便民不为功”“成本甚钜,当可设法。惟口岸甚多,商情必通,而后根基可固”等条大为赞赏,以致后来专门上奏保举,说他“操行正大、识见阔远、才力坚卓、条理精详”“盟心在局,数年不受一毫薪水,尤为近今罕见”,并评价他是四川盐务改革中的最大功臣。

此外,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四川盐法志》纂辑职名下27个人中,贵州人多达11位,占籍贯可考者一半。这11位贵州人,除了宝桢、唐炯、华联辉外,还包括“编辑”罗文彬(贵州贵阳人)、“校定”文天骏(贵州清镇人)、“检校”陈鸿作(贵州贵阳人),以及“采访”阮全龄(贵州息烽人)、于德楷(贵州贵阳人)、华国英(贵州遵义人)、刘藻(贵州贵筑人)、赵廷璜(贵州遵义县人)等。这些人,既是编纂《四川盐法志》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丁宝桢四川盐务改革的中坚力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四川盐法志》,是由众多贵州人参与编修的,而发生在晚清的那场四川盐务官运商销改革,也是由众多贵州人联手参与、推动的。(据《贵州日报》)